

【晋·袁宏 撰】

【李兴和 点校】

《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断代编年体史书，其断限上起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5年—19年）的农民大起义，

下迄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共载220余年史事，整整包括了东汉一代

的历史。全书三十卷，分为光武、明、章、和、殇、安、顺（附

帝）、质、桓（附少）、献十一纪，约三十五万余字。

後漢紀

集校

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33年），不久父亲死后，家道就此中衰，

史载袁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后得到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

尚的赏识，任其参军，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稍迁史部郎，随后

又出任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病故于东阳任所，终年四十九岁。

【晋·袁宏 撰】
【李兴和 点校】

袁宏

後漢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集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宏《后汉纪》集校/ (晋) 袁宏撰; 李兴和点校.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74 - 0

I. 袁… II. ①袁…②李… III. 中国—古代史—东汉时
代—纪传体 IV. K234. 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096 号

责任编辑: 金 沙

责任校对: 段建堂

封面设计: 刘 雨

袁宏《后汉纪》集校

〔晋〕袁宏 撰 李兴和 点校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85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574 - 0

定 价: 68.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校点前言

李兴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史家辈出、史体多样、史著繁富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史著的繁富，至“一代之史至数十家”。^①后汉史著继《东观汉记》之后，先后就出现了十三家，袁宏的《后汉纪》（以下简称袁《纪》）就是其中之一。这诸家后汉史著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大部分都已亡佚，或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只有袁《纪》与被列为正史的范曄《后汉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样，袁、范二家后汉史就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东汉历史的基本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早在唐代，刘知几就说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②这话简明扼要地道出了袁《纪》在诸家后汉史中占有的突出地位。然而，袁《纪》虽具有较高的价值，但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却十分严重，鲁鱼豕亥、衍夺倒讹的讹误比比皆是，这严重损害了该书内容的正确性与真实性，影响了它的科学研究价值。因而，对该书进行科学的整理，使其原貌尽量得以恢复，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较为可靠的后汉史著作，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

一、袁宏及其《后汉纪》的一般情况

《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断代编年体史书，其断限上起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年—19年）的农民大起义，下迄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共载220余年史事，整整包括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全书三十卷，分为光武、明、章、和、殇、安、顺（附冲帝）、质、桓、灵（附少帝）、献十一帝纪，约三十五万余字。

《后汉纪》作者袁宏，字彦伯，小字虎，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① 《隋书·经籍志》正史小序。

②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人。袁氏为一世宦家族。袁宏的七世祖袁滂，东汉灵帝时位至司徒。六世祖袁涣，汉末历任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曹魏时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袁涣之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① 祖父袁猷，东晋时“历位侍中、卫尉卿”。^② 父亲袁勛，任临汝令。袁宏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不久父亲死后，家道就此中衰，史载袁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③ 后得到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的赏识，任其参军，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稍迁史部郎，随后又出任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病故于东阳任所，终年四十九岁。

袁宏在晋末“为一时文宗”。^④ 史称：“宏有逸才，文章绝美。”其时人亦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⑤ 唐人修《晋书》时，即把他归入《文苑传》中。袁宏一生的著述，除《后汉纪》外，见于《晋书》本传和《隋书·经籍志》的有：《袁宏集》二十卷、《集议孝经》一卷、《竹林名士传》（《水经注》引此书名为《竹林七贤传》）三卷、《正始名士传》三卷及诗、赋、诔、表等杂文三百余篇。袁宏的这些文章中，以《咏史诗》、《东征赋》、《北征赋》^⑥ 和《三国名臣颂》（《文选》卷四十七载此篇名为《三国名臣序赞》）最为知名。此外，《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收载有他的《去伐论》一篇（亦收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十七）。从这些作品看出，袁宏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除文学外，对经学与历史亦有研究。他虽“以文章名世，而史学尤卓绝”，^⑦ 《后汉纪》就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唯一流传下来的史著。此外，他的两部《名士传》也是人物传类的史著，其余作品亦多咏史、评史之作。

袁宏生活的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在思想领域，儒、释、道并行，玄学兴盛，各种思想横流，真是一个“蜜蜂以兼采

①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裴松之注引荀绰《九州记》。

② 《晋书·袁瓌传》。

③ 《晋书·文苑传·袁宏传》。

④ 《文献通考·经籍考·史·编年》卷一百九十三。

⑤ 《晋书·文苑传·袁宏传》。

⑥ 《东征赋》、《北征赋》都已散佚，其中《北征赋》在《水经注》中尚引有数条；《咏史诗》现存丁福保编《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中。

⑦ 钱穆：《袁宏政论与史学》，载1955年11月20日香港《民主论》第六卷第二十二期。

为味”^①的时代。与此相应，史学思想亦出现了一个“丰富而杂乱”^②的局面。袁宏的出身和生世决定了袁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思想，但他又不能超越时代，不免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本文不准备全面深论袁宏的思想，只就“名教”思想简要谈谈，或有助于对《后汉纪》的理解。

袁宏认为，“君臣父子，名教之本”，^③“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④反映出他的“名教”实际就是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信条和伦理道德原则。他还说：“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本。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⑤这条材料较充分地反映了他“名教”思想的性质。他把高下、尊卑、贵贱、君臣、父子这些“人伦”，看成是“不易”、“不逾”的，把它们与“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等同起来。只要这种“无穷之道”与“不易之本”的“人伦”“永固而不逾”，则“名教大定而不乱”矣。不难看出，这种“名教”思想是典型的传统儒家思想。所以说，袁宏的思想是“以儒术为其思想体系之主干”^⑥的。

袁宏的史学思想是受其“名教”思想支配的。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⑦这典型地反映了他史学思想的性质，指明了史传的作用就是“通古今”与“笃名教”，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这也就是说，“通古今”是为了“扶明义教，网罗治体”，“庶以弘敷王道，补前史之阙”。^⑧可以说，“通古今”与“笃名教”这六个字是袁宏史学思想的核心。“笃名教”是袁宏撰写《后汉纪》的根本目的，也是他组织取舍史料与评史的标准和原则，故被称为“是整部《后汉纪》的灵魂”。^⑨

① 张璠：《周易解·序》，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二期葛兆光《晋代史学浅论》一文。

② 葛兆光：《晋代史学浅论》，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二期。

③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袁宏曰”。

④ 袁宏：《后汉纪》卷十三“袁宏曰”。

⑤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袁宏曰”。

⑥ 钱穆：《袁宏政论与史学》，载1955年11月20日香港《民主论》第六卷第二十二期。

⑦ 袁宏：《后汉纪·自序》。

⑧ 袁宏：《后汉纪·自序》。

⑨ 周天游：《袁宏》，见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

袁宏在《后汉纪·自序》中谈《后汉纪》的撰写过程时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从这段话，可看出袁宏撰写《后汉纪》的时间、史料来源及动机等问题，分别讨论于下：

（一）撰写的时间

袁《纪》撰写于何时，《晋书》本传失载，袁宏在此也只谈到撰写时间长达八年以上。金毓黻先生认为：“袁宏《后汉纪》，作于东晋康帝之世。”^①据考，康帝于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六月即皇帝位，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崩，在位仅两年零三个月。故康帝之世，袁宏年龄当在十五六岁之间，则《后汉纪》始作于袁宏的未冠之年。据《晋书》本传载，他作《咏史诗》正是少年未达之时，并因此诗得到谢尚的赏识，说明那时他已开始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金老之说应是可信的。如此，估计袁《纪》大致成于穆帝永和末年，约在公元351年—354年之间。

（二）史料来源

谈到袁《纪》的史源，我们应先辨正《四库提要》肯定的两个问题。

第一，袁宏所说的《汉纪》为何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汉纪》按语认为：“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非张璠书也。”此《汉纪》非张璠《后汉纪》实然，然其谓为荀悦《汉纪》则误矣。盖此是指《东观汉记》，古人《汉记》、《汉纪》往往混用，《四库》馆臣不辨此习而误。《东观汉记》是成书最早、史料价值最可靠的东汉史著，诸家后汉史竞相采用，“实为后汉诸史之渊藪也”。^②袁宏也不能例外，《东观汉记》也是他必参的基本文献。袁《纪》依据《东观汉记》的事例很多，现举一二如下：如顺帝永建四年郡国献珠之事，范曄《后汉书》（以下简称范《书》）、《通鉴》诸书皆记为桂阳太守文苍所献。袁《纪》作：“汉阳都尉献大珠。”^③《东观汉记》作：“汉阳率善都尉蒲密因桂阳太守文苍献大珠。”^④互相比勘，袁《纪》取材于《东观汉记》甚明。又如，袁《纪》卷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

② 廖吉郎：《两汉史籍研究》，台北广东出版社民国七十年三月初版，第131页。

③ 袁宏：《后汉纪》卷十八顺帝永建四年。

④ 乾隆武英殿聚珍本《东观汉记·顺帝纪》。

十五引用了一段“本传”之文，计七十字，惠栋即指出：“栋案：‘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①此皆袁宏取材《东观汉记》的明证，其他事例尚多，不再赘述。再以东汉初事对比袁、荀二《纪》，荀《纪》卷三十与袁《纪》卷一、卷二虽有部分史实相同，而袁《纪》所载则远详于荀《纪》，这又怎能实指《汉纪》为荀悦之书呢？可见，《四库提要》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二，《四库提要》又说，袁《纪》“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这里的《汉纪》指另一部略早于袁《纪》的断代编年体史著——张璠《后汉纪》。蒲起龙也认为：“宏即採摭璠《纪》为之也。”^②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细读袁宏《自序》，他见到张璠书时，《后汉纪》的编撰已达八年之久，其书世上已“颇有传者”，怎能说大致以张璠书为准？其实，《四库提要》曾把张璠书保存在裴松之注和李贤注中的几条材料与袁《纪》有关内容进行了比较，其结论也是：“璠《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有所点窜，互有详略。”这里再举一例：袁《纪》载荀悦撰《汉纪》事作：“悦字仲豫，颍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综儒、史。是时曹公专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颇有才思，以《汉书》为繁，使悦删取其要，为《汉纪》三十篇。”^③而张璠《纪》作：“悦清虚沈静，善于著述。建安初，为秘书监侍中，被诏删《汉书》，作《汉纪》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④袁《纪》讲了荀悦作《汉纪》的原因，张璠《纪》未载；张璠《纪》对荀《纪》作了简要的评价，并讲了其书的流传情况，袁《纪》却未载。是两书对史料的取舍就有很大的差异，可见袁《纪》大致以张璠《纪》为准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人说：“他采取张璠《后汉纪》的材料，也只是关于汉末的一段。”^⑤这也不尽然。其所取张璠《纪》者，乃因诸史“错谬同异无所取正，唯张璠《纪》差详，因参摭记传以损益之”，^⑥即据张璠《纪》对史料有所增删和考订而已。

袁宏自云凡参考文献达数百卷，此语确非虚言。据《隋书·经籍志》，他所参考的文献有《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

①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八十八。

② 蒲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证释》。

③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九献帝建安十年。

④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

⑤ 李宗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第166页。

⑥ 《文献通考·经籍考·史·编年》卷一百九十三。

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汉山阳公记》（即乐资的《山阳公载记》）十卷、《汉献帝起居注》五卷、《汉名臣奏》三十卷。《汉灵帝起居注》《隋志》即未著录，诸郡耆旧先贤传亦难确指，均不知卷数，但上述诸书已达六百五十卷之多，王鸣盛称：“据此，则宏所採者亦云博矣。”^①这个“博”字，袁宏当之无愧。

袁宏参考的这些文献，按性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东观汉记》，这是袁《纪》的基本史源。第二类是诸家后汉史，这是袁宏博采众说的一类书。第三类是有关汉末历史依据的基本书籍，如《山阳公载记》和灵、献二帝《起居注》。《东观汉记》所载史事仅“迄灵帝”，^②献帝时事虽经杨彪补续，但经汉末之乱亦已散佚。袁《纪》记献帝时事颇详，就是得力于这类书。第四类是诸郡耆旧先贤传，这是专记耆旧节士、名德先贤的地方人物传。袁宏从“笃名教”的思想出发，注重人物生平事迹与德行操节的记载，故对这类书颇为重视。最后一类是《汉名臣奏》。袁宏注重载文，其取材除诸书之外，还直接参考了该书。袁《纪》中保存了许多佚文，可能都与此书有关。

（三）袁宏撰史的动机及其对史实考订的态度

袁宏撰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网罗治体”，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这是中国封建史家的共同出发点。此外，他复因后汉诸史“烦秽杂乱”，想补前史之“阙略”，正诸书之“错缪同异”，以免“千载之外，所诬者多”。^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袁宏整理、考订与损益史料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以致“疲而不能定”，见张璠书后，又“复探而益之”。他在记东汉中后期三公任免时多遗漏失误，但他敢于指出：“凡三公居位，或不书，史失之也。”^④可见他修史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袁《纪》被前人称为“比诸家号为精密”，^⑤是与这严肃认真的态度分不开的。

袁《纪》虽号精密，然其粗疏之处亦在所难免。如其对时间的考订就不甚精审，率多错误，《通鉴考异》中已多有指明。王先谦也指出：“袁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后汉纪》”条。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别史》卷五十。

③ 袁宏：《后汉纪·自序》。

④ 袁宏：《后汉纪》卷十八顺帝永建元年。

⑤ 《文献通考·经籍考·史·编年》卷一百九十三。

《纪》记事，恒视范《书》后一二年，殆不足异。”^①这其中除了受其类述体例所限、史源不同和后人传抄错误之外，自难排出考订不精之误。此外，还有个别史实重出的现象。尽管如此，袁《纪》的这些弱点是掩盖不了它所具有的较高的史学研究价值的。

二、《后汉纪》对编年体的继承和发展

袁《纪》是继承荀悦《汉纪》而成的史书，“其著述体例及论断，全仿荀悦《前汉纪》为之”。^②

荀悦承《春秋》编年之体，创立了断代编年的体裁。它除把编年史体用来纪一代之史外，还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③的方法。所谓“例系年月”，就是按一定体例以时间为经记载历史的方法，即“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④也就是杜预所说的“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⑤这是编年体的共性。“通此其事”，就是分类叙述历史或记载人物、事件的方法。这是荀悦为克服编年体史书史事割裂与述史范围局限的弱点而作出的创新。它用横向述史的方法，突破了述史范围的局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史事割裂的弱点，是对编年史体的重大贡献。

袁宏推崇编年体，以为：“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并认为：“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⑥他继承了荀悦断代编年之体，继续采用荀悦《汉纪》“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因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这人的其他的事”^⑦的类举方法。如卷五光武建武六年述王元说隗嚣事而及隗嚣之上书，又及来歙责嚣事、王遵谏嚣、隗嚣与班彪论形势、班彪的《王命论》、班彪小传、窦融责嚣之书、诸将征嚣之议及马援上书献策等。他抓住了劝隗嚣降汉这一线索，类举了多人、多事及多种言

①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校补》卷五十九。

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后汉纪》”条。

③ 荀悦：《汉纪·序》。

④ 《史通·二体》。

⑤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

⑥ 袁宏：《后汉纪·自序》。

⑦ 白寿彝：《学步集·谈史学遗产》。

论，占用了三分之一卷强的篇幅，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刘秀征隗嚣前的背景和各種政治活动。这是一则比较典型的例子。

但是，袁宏并非简单机械地继承，而是把这种体裁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这种分类叙述历史或记载人物、事件和言论的方法的完善作出了贡献。他把“通比其事”发展为“言行趋舍，各以类书”，^①“在这里，他正式提出了一个‘类’字来”。^②“类书”的提出，既在理论上有所贡献，其对体例也有所发展和创新。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袁宏写人物时把荀悦列举数事的初级形式发展为较完整的人物小传，并大量采用这种形式，增加了人物传的类别。袁宏记人物，除将人物有涉国事的重要言行事迹随历史事件的主要进程载出外，还用“类书”的方法，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对人物生平的其他事迹进行简要的记载。这种人物小传在荀《纪》中已具雏形，如荀《纪》卷一述项籍而及其体貌和起兵前情况，述张良而及其早期事迹；卷二十九述董贤则抓住董贤显赫尊贵的特点类举了数事，等等。袁宏在荀《纪》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记载范围，涉及到了人物生平事迹的各方面，使其在形式上发展为较完整的人物小传。如卷三的卓茂传、卷六的郑兴传、卷十一的韦彪传、卷十二的郑弘传与曹褒传等，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人物的姓字、爵里、世系、生平主要事迹等。如韦彪传，简要叙述了韦彪的姓字与世系，少年时的孝行，出仕后所历诸职及其论选举之议，称疾归家后的德行，最后说到其所著书——《韦卿子》，共用了近四百字。在郑弘传中，记载了郑弘的姓字籍里、一生所历诸职，直记到郑弘之死。重点记了他论选举、议不宜答乌孙使和疾笃上书陈窦宪奸恶三事，全传共六百四十九字。从形式与内容来看，这两个传都具有了较完整的人物传的性质。当然，这些人物传所载多较简略，原因是人物有涉国事的其他言论事迹已在有关部分载出，且受编年体裁所限，篇幅不宜过长。因它们较简略，不及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详细全面，故我们称之为小传。

袁《纪》中，这种形式与内容都较完整的人物小传是大多数，几乎光武以后的重要人物都是这种小传。但是，也有一些小传，由于人物事迹的多寡和重要程度不同，记载也就有详有略。又因附载人物小传的地方不同，也会影响小传的完整性。袁《纪》的人物小传往往是因事附出，有的安排在

① 袁宏：《后汉纪·自序》。

②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该人物首次参与历史活动后，有的附在该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后，有的则记在该人物参与的某一事件之后。那种不完整的人物小传，大多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中，因其附于初次经历的史事后，不能预述以后的活动，就很难使小传完整。如卷一的邓晨传、隗嚣传和公孙述传就是这种情况。人物小传的组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说是第一、第二两种方法的结合。如卷一记载了李通与冯异的早期活动，在卷六冯异死后及李通罢大司空后又再次述及其有关事迹，两部分相合，再加上其间的有关事迹，该人物的生平活动就比较完整了。这是袁《纪》处理人物传的一种特殊形式。

袁《纪》中大量采用人物小传的形式，广泛记载了各类历史人物，包括了宗室、外戚、三公名臣、循吏、儒林、文苑、隐逸、党锢、宦官、方术等方面的人物，与范《书》相比较，几乎包括了纪传体史书人物传的各个类别。值得指出，袁《纪》中从光武郭皇后到献帝曹皇后，共有十九个皇后、贵人的小传，虽有的甚简略，但它们却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东汉的后妃。在编年体中载皇后传，是东汉特定的历史内容决定的，也是袁宏在体例上的创新。

另外，在人物小传中，袁宏除记载人物各方面的情况外，尤注重人物德行节操的记载。他大量采用“类书”的方法，把能反映某人某种德行节操的事迹列举数例，最后进行概括性的总结，一语点明底蕴，如记卓茂则曰：“茂教民制法，皆此类也。”^① 写度尚则曰：“其优贤表善，皆类此也。”^② 袁宏重视这类多与国事无关的德行节操的记载，与他“笃名教”的思想有密切关系，想以此来激励风俗，以维护封建统治。实际上，这也是他设立和大量采用人物小传的原因，是他批评荀悦“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韞而未叙”^③ 的原因，也是他注重诸郡耆旧先贤传的原因之所在。

人物小传的设立，使历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在编年体史书中有了较完整的记载，突破了编年体不与国事者不书的体例，进一步扩大了记载范围。另外，人物小传横向对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进行记载，克服了编年体单一以时间为经的单调结构，使其内容生动饱满起来，兼得编年与纪传二体之长。这是袁宏在荀悦基础上，进一步借鉴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在编年史体例上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① 袁宏：《后汉纪》卷三光武建武元年。

②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桓帝延熹七年。

③ 袁宏：《后汉纪·自序》。

第二，大量采用类传。袁宏在人物小传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类书”的方法，把历史人物按各种关系分类进行叙述，组织成一个个人物传群，形式上颇似纪传体的类传，故我们亦如此称之。他对人物分类——组织类传的方法，主要是按人物的性质相同或相似来分，如卷六书鲍永、宣秉、王良所谓良吏，卷十一的江革、毛义、薛苞三孝子，卷十九述任峻、苏章、陈琦、吴祐、第五访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徐稚、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处士，等等。最为典型的是卷二十三郭泰、仇香、黄宪、陈寔等名士的类传。在郭泰传中又类书了宋仲、韩卓、茅容、魏昭、孟敏、袁闳、黄元艾、贾子厚等人，全文长达三千余字，占了三分之一卷强的篇幅。其中人物事迹写得生动形象，可与范《书》媲美。中国史籍中类传的出现由来已久，然在编年体中大量采用，这却是袁宏的创新，是他在体例上的又一贡献。类传的采用，在记载范围的扩大、克服结构的单调和增强内容的生动性等方面都又进了一步。

其三，记载其他社会历史现象时，采用了纪事本末的方法。袁宏把“类书”的方法推而广之，不仅仅局限于记载人物，还用来记载诸如四夷、典章制度和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如他在卷十五述西域，用了一千四百多字近半卷的篇幅，集中而简要地分别叙述了西域诸国的地理、历史、风俗、物产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形式颇像班、范的《西域传》，其中有些内容还可以对《西域传》进行补充。又如，卷二十六集中记载了东汉的宗庙之制，又附载蔡邕议宗庙迭毁之文一篇，对于研究考订东汉宗庙制度颇为有用。其他如卷八述匈奴、卷十载佛和天官制度以及卷十二言《五经》，都是“以事为主”^①集中记述某类社会历史现象的纪事本末之笔。纪事本末的方法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尚书》中便有载一事始末的篇章，《史记》也有书志记事的专篇，然而用之于编年体，则是袁宏充分运用“类书”的创造，是其在体例上的又一创新，这对以后纪事本末体的发展不无一定影响。此法在编年史中的运用，使各类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能够得到较为集中完整的记载，又进一步扩大了记载范围。

冯己苍曰：“荀书略而裁，非关乎政治之得失不苟存也，即立身大节，间亦缺如，袁书增其所删。”^②袁宏为了要补荀《纪》内容过略之失，就必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② 冯己苍手跋，见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两汉纪》周叔弢捐本。

然要在体例上有所突破才能实现。白寿彝先生指出，袁《纪》“是编年史，同时也吸收了纪传史的长处，如纪两汉之际豪杰并起和东汉末年的朋党，都是不能为年月的框子所局限住的”。^① 白先生所见极是。袁《纪》这三个体例上的创新，就是为适应内容增加的需要，吸收纪传体的长处，创造革新取得的成就。

以袁《纪》来看，这种荀悦创立，经袁宏充分发展的体裁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扩大了编年体的记载范围，使编年史能够收载无与国事的各类历史人物、事件、言论和现象，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刘知几所批评的“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② 的记事过简的弱点。第二，增强了编年史结构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以时间为经，以横向联系为纬，从纵横两方面把有关的人物、史事、言论和历史现象组织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增强了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三，增大了编年史的容量。记载范围的扩大和结构的严谨，使其一定量的篇幅能够记载更多的内容。袁《纪》仅用了不足范《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就收载了东汉历史的主要内容，有许多内容还超出了后者，真正具有“辞约事详”^③ 的优点。刘知几言：“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④ 最后，增强了编年史的生动性。“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⑤ 这是编年体史事割裂的重大缺点。袁《纪》虽不能完全克服这一缺点，但其“类书”的大量运用，尤其是人物小传、类传与纪事本末三法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物、史事之间的联系和完整性，增强了它的生动性。这是我们读袁《纪》时很少“寡味”之感的原因。

荀悦之后，断代编年与断代纪传二体共同成为了我国史籍的两大主流，“班、荀二体，角力争先”，^⑥ 仅据《隋志》和新、旧《唐志》的著录，断代编年之作就达几十家之多。虽然，前代学者在论史体发展时，为强调荀悦创立之勋，多不谈及袁宏。但袁宏对断代编年体的恢廓开拓之功，《后汉纪》起到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及其对编年体的创新和发展，是应

① 白寿彝：《学步集·谈史学遗产》。

② 《史通·二体》。

③ 范晔：《后汉书·荀悦传》。

④ 《史通·叙事》。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⑥ 《史通·二体》。

该充分肯定的。

三、《后汉纪》的史学研究价值

袁《纪》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举其大端，有保存佚文、保存史料和足资订正他书讹误等三个方面。

（一）保存佚文

1. 保存了大量文章和言论。长于载文和记言是袁《纪》的一大特点，在有限的篇幅中，全书共收录了诏令奏议疏表等三百五十四篇和重要言论二百余段，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其中仅见于袁《纪》的文章有六十七篇，重要言论十四段，其与范《书》或他书所载者互有详略、可互为补充的就更多了。这些为他书所漏载的文章和言论有很多对历史研究是很有用的。如明帝永平五年《听东平王苍归蕃诏》、永平十三年耿秉的《言匈奴事疏》与《兵事议》、明德马后的《禁诸马干政诏》、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延平元年和熹邓后的《举逸隐大儒诏》、顺帝永建三年正月《复汉阳田租诏》、阳嘉二年五月张衡和马融二人的《京师地震对策》、熹平五年曹鸾的《讼党人书》、陈纪的《论复肉刑书》、献帝建安二十五年的《封魏王丕策》与《禅位诏》，以及梁统辞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之言、郑弘的选举不宜专限三辅论及荀彧谏曹操世子宜从征伐等。它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刑法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其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就以章帝初年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①来看，其中谈到“选举不实，咎在刺史、二千石”，“明上下之称，班爵号之制，定卿大夫之位”，“州官秩卑而任重，竞为小功以求进取，生凋弊之俗”及“明慎刑罚”几个方面，都是有关当时政治的几个重要问题，而此文诸书皆不载，可见其价值。

一般来说，袁《纪》所载之文与范《书》相较大多较为简略，但由于抉择去取的不同，袁《纪》之文亦有详于他书者或互有详略可互相补充者，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卷二十质帝本初元年朱穆给梁冀的奏记中有：“今宦官俱用，水蠹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货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其中调发的具体数字和户口流亡的情况，是研究当时赋税和生产的重要经济史料，而范《书》、

^① 袁宏：《后汉纪》卷十六安帝永初三年。

《通鉴》恰好漏掉了。又如，卷九明帝永平三年钟离意《谏起北宫疏》中多出诸书的“今百姓须雨而天久旱”及“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谓忧矣”等语，亦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再如，建武九年马援的《言破羌以西不可弃疏》也以袁《纪》所载最详。其中有：“允吾以西，数十里一城，城皆完坚。旧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径辄有候、尉，故虏不得妄动。”这反映了汉代在西北地区的屯卫制度和在金城一郡的基本情况，是重要的史料，而范《书》略记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①其优劣一望而知，不待烦言。

2. 保存他书的佚文。袁《纪》中还保存有一些他书的佚文，这有利于辑佚和认识这些书籍。

保存《东观汉记》的材料。袁《纪》在记灾异之后常引一段“《本志》曰”，全书共引十九条，五百六十余字。其所以被称为《本志》者，即因其出自成于东汉历朝史臣之手的《东观汉记》这一“本书”有关志文的缘故。这几条材料绝大部分可在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中查到，有两条属《天文志》，所以它们应该出自汉末蔡邕所撰《十意》中的《天文意》与《五行意》。^②《四库》馆臣曾谓《天文意》已全佚，袁《纪》保存的这两条材料正好起到了补缺的作用。另外，上面提及的袁《纪》引用的那条《西域传》的材料，清代重辑的《东观汉记》也漏辑了。

袁《纪》中还保留了四段“华峤曰”，多达七百二十多字。卷十八顺帝阳嘉元年刊载的一条，范曄《后汉书·郎顗襄楷传》“论曰”即略采于此，只是个别字句有所变动罢了，这一点前人未指出。

（二）保存他书未载的史料

袁《纪》保存的史料十分丰富，现略举其重要者论列如下。

如卷十载佛，以纪事本末的形式，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中，记载和介绍了佛教的教义、经典、影响和传入中国的情况等，是比较全面的。如其所说：“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

^① 范曄：《后汉书·马援传》。

^② 蔡邕《十意》称“意”而不称“志”者，盖避桓帝讳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十载蔡邕《成边上章》言《十意》细目：“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朝会意》、《五行意》。”严氏按语曰：“其余二意盖《地理》、《艺文》也。”

而得为佛也。”所论颇为精当，“试详味之，乃知佛法大意已尽于此”，^①堪称精妙之笔。虽然，它记载的“有经数千万”等并非全是东汉时的情况，但袁《纪》是在史籍中载佛最早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直受到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者的重视，广为诸书所征引。

又如，卷十四载：“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曰‘四姓小侯’，置《五经》师。”这则材料亦不见于他书，李贤即引此注范《书》。它使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四姓小侯”，并反映了明帝时儒学兴盛的情况，是研究学校教育史的一条有用的材料。

又，我国方志之作萌芽于先秦，其兴盛则在东汉，“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②但其详情很难知道。袁《纪》卷二十一载：袁汤“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这条史料反映出，方志的撰修在东汉主要还是由地方政府主持，经过地方官吏完成的，这是研究我国的方志史和史官制度的不可多得的佐证材料。

袁《纪》中保存史料最多的是汉末一段，尤其是对李傕、郭汜之乱记载最详。它的内容超出诸书者非一，比《三国志》、范《书》有关纪传及裴松之注、李贤注所引诸文还要丰富。如卷二十八载兴平二年献帝出长安后给郭汜的两段诏文，后之张济及杨定二人有所请托事，卷二十九载建安元年曹操到洛阳后赏罚诸臣之详情等，皆为诸书所不载。司马光编《通鉴》，这一部分主要就取材于袁《纪》；李贤注引袁《纪》文，也以这一事件最多，达八条之多。这是袁《纪》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最完整、最重要的材料。

（三）订正他书之误举例

由于各种原因，古籍中都会有许多错误，袁《纪》也在所难免。但是，袁《纪》中也有大量正确的内容，可资订正其他书籍中有关的错误。这方面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了时间、人名、地名、官爵、史实和文字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有关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现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六年有：“夏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袁《纪》卷十六“乙丑”作“乙亥”。据考，是月乙亥为初二，无乙丑日。范

①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袁宏论佛法”条。

② 《隋书·经籍志》杂传小序。